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一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

第一冊

利瑪竇司鐸和
當代中國社會

裴化行著
王昌社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震旦大學史學研究所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第一冊

Le P.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t. I

每冊定價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Henri Bernard

原譯者 王昌社 東方學藝社

上海蒲石路二三一號

天津法租界十二號路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印 刷 所

東方學藝社

Gathasia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P. Henri BERNARD, S. J.

Le Père Matthieu RICCI

et la

Société Chinoise de son temps

(1552—1610)



Tome I

准 惠 教 主 海 上

印 館 書 印 湾 山 土 淹 家 徐 海 上

Déjà paru :

Aux portes de la Chine.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e siècle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誌 334 pages

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一五五二—一六一〇年）

序

作者寫這部書，是以使本書成爲利瑪竇司鐸的一種有批評性的傳記爲第一要義，讀者們披閱之餘無疑的要引爲詫異，以爲本書撰成問世未免過早吧？其實，當舉行這位中華傳教事業創始人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時，本書所有最重要的材料差不多都已由文多利司鐸（於一九一至一九一三年間）發表刊行，且加註釋了；他用心的精細是無可比擬的。不過事實上，十二年前我們雖已擬定了計劃，從事編纂利公的行實，可是那時，誰都還不會着手利用這些慣見的文件，和這部『關於中國的雜記』那是憑着一種那麼信實，那麼可靠的大學問來編輯的。我們就這位著稱的先進人物的著作，於每一頁中多所援引，却竭力保存他的原質。我們又竭力設法，就中國目前所有對人對事，種種經驗之所得，以作增益。再則十六世紀末葉所播下的福音種子，既然已經長發了，成爲我們今日所艷羨的，這棵中華聖教的喬木，那麼，目前的事實，說是我們所藉以洞燭已往的光明，這也何足爲奇？

這部新作品，可以說得無非是我們在三年半前便已公諸當世的那一組書籍，或是散文的續編，和集成罷了。有了一本包括着各種分析目錄的補篇，合着一種有方法的對照，便可以說明這全部書籍的一貫條理。給這書作介紹的是『天主教十六世紀中在華傳教誌』一書。我們在這部書裏，曾經討論過，也應用過，轉譯的原則，現在我們也不準備放棄這些

原則。有幾件事情，如果在個人的列傳中隨便列入，未免過嫌突兀，要是丟開不錄吧，却又頗為重要，未便擋置一邊。因此我們另外發刊了三種單行本（一）「鄂本篤傳」，又名「新疆回族風土紀」（一六〇三至一六〇七年）（二）大柵欄公墓的緣起」一名「欽賜利公葬地記」（一六一〇至一六一年）（三）「利瑪竇來華灌輸西學誌」。在這些不同的作品中，也和在我們所有其他著述中一般，（尤其是關於利公的文集）讀者們可以看得出我們小心翼翼，追蹤着這位義籍耶穌會士的一舉一動，並非只為好奇心所驅使，而我們却要請他們認清這一層，就是我們對於利公，雖則竭誠崇敬，却絕不因此而有妨我們率直的批評。我們所寫的是利公的正史，不是裨官野乘，所需要的惟有真實。我們唯一關心的要務，便是在可能範圍內，盡量搜集事實，照錄原文，不加更易，藉以保存他的本質和他固有的本色，使每一讀者，都能樹立信心。這樣，雖則本書絕不是衛護聖道的著述，可是將來也許要從這部傳記中獲得衛護聖道的價值。

在我們眼裏看來，中華傳教的歷史，決不是一部道德大革新的歷史，也不是一種但憑臆測，以致利公逝世四五年後，引起了中國禮儀爭議的歷史。這是一部宗教史，這就是說一種精神生活；因為這是完全看不出的生活，所以當然有受人攻擊的可能。傳佈真理的成效如何，也並沒有一定，却總不失其為真實的生活。寫這種史記的作家總該記取，務使他所傳述的事蹟，不至為人所不欲聽聞。我們講這時代中天主教在華發展的情形，原不必採錄一五五〇年以前所有的史料，這已由摩勒氏在他所著「一五五〇年以前的中華基督教徒」一書中，搜羅殆盡了，而我們也早已把他公諸當世，發刊了「元代鄂爾多斯基督教派蒙古人的新發現，和遠東基督教義的古蹟」一書。此外，我們更特別注意到這件史事所佔的時間和空間，論時間，這便是作者所以刊行「中國人的智德，和天主教哲理」一書的宗旨，這是一篇性質很廣泛的論

文論空間，作者在「中國大羣島中的斐利賓列島論遠東精神征服」（一五七一—一六四一年）一書中曾悉心研究過比較的傳教學術。這兩部初步的作品，旨在使人對於卓越的靈蹟，能有嚴正深切的了解，比較容易一點；比方，天主降生爲人，死而復活，在聖教會裏生活着，行動着，因而憑藉一種亘久不輟的宰制，亭毒着宇宙間，四面八方，天地萬物的自然界，西方如此，遠東何獨不然。

現在外面的輪廓，差不多已經完全劃定了，我們只須把中央的凸出部份削平一下，就行了。但是正因教士們所傳達的宗教和一切人事密切相連，那由宗教史引起的反響，就牽涉到種種視線的集中點，這些集中點不妨說是漫無止境的，這層，利公早已講過了（一五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說：「假使我們要敍述我們所經歷過的種種不同的事情，這遠不是慣見文件的問題，却是一件有關年鑑的事。換一句說，就利公和他的後繼人本身說，是歐洲和遠東「對面相逢」說得再切實點「相擁抱」。」

這題目太大了。假使我們走得進耶穌會在華舊教士們先後撰著的五六千冊的書庫，而不禁稱奇納罕，那麼，討論起來，我們更不知從何着墨啦。現在呢，好在我們手裏已經抓到了東西兩世界文化密切溝通的憑証，往往是有日期，有時候還劃過押的憑証，因此，我們對於這兩文化世界四百年來互相交換的情形，也就不至毫無標的，而發不符實際的議論了。從此以後，不管是利瑪竇司鐸的雜記；或者是湯若望神父的親筆記錄；或者是南懷仁神父沒有刊佈的函牘——還有許多關於修德立功，和記敍新奇的親筆書信，不必說——我們在此詮解尋繹的汪洋大海中，總已有了定向的南針，使我們不致迷途失道啦。我個提及這幾位作家，並不想掩飾我們確曾利用過他人作品，而利用得不少，不過我們參考過的書籍，既然

多得不可勝數，如果一一提出，只怕讀者們感覺厭煩，還是免了吧。

此外我們跟着利瑪竇神父踏進明末的中華，便體驗到，如果我們要把這過渡時代研究一下，這位傳教士，至今還稱得最好的指導人物。我們在歐西的編年史家和傳記家的著述中，慣常找得到種種啟迪，可是那些用華文寫成的歷史作品，實在都不足以供人玩索，尤其是因十六世紀末葉中，清帝乾隆大興文字獄的結果，把明末清初所有幾千部很有趣味的書籍，藉口書中有仇視滿族侵畧者的文詞，便毫不顧恤的銷燬了一大部份；這些書籍便是現代新中國青年們懷着一片熱忱，所欲竭力搜集的（目下搜集的還不多大概還不到幾百部）因而證實了我們從歐洲方面得來的許多史料，証明利瑪竇司鐸和他最先後繼人，當時會做着東林黨所由產生的中心人物：他們的言論行動，在當代思想學術界，大放光明，而在明代萬曆以後，東林黨是佔着那麼重要地位。因此，我們從這已往的陳跡，悉心注意到現在所能獲得的資料，希望能夠考據家稍盡綿薄，協助他們，不論在歐洲的檔案室內，或者在中國至今還沒有開發的藏書樓裏，從事搜集史料以期獲有新發現。這便是我們所以用意義更廣泛的字樣，把本書改稱「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的緣起。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作者序於徐家匯神學院

引言

近三十餘年來，研究聖教創始時代的史家，只知着眼於這古世界中傳播福音各方面的外觀，便自感滿足，他們雖曾再三加以分析，要窮究基督教本質的原委，却還相差很遠呢。可是在十六世紀中，却輪着那由於反革新運動而復興的公教教義，在一個比古羅瑪帝國還廣大的領域中作深入的嘗試，而獲得部分的成功。

這種嘗試的企圖，環境也許比耶穌基督教降生後五十年前後時代還要複雜。那時聖教會正在猶太民族中萌芽着。這猶太小民族又聚居在地中海的周圍地帶。因此，這位出身異教國的宗徒聖保祿，播散基督教會的種子，簡直走一步散一步，不過基多所訓示的理想，還可以在口頭傳說中找得到，在罕有的著作中，也已有了定論。

至於那幾位最先到遠東來傳教的葡萄牙教士們，尤其是那一位聖方濟各沙勿略，一到了這閉關自守，別有天地的中國，却到處碰壁，障礙重重，進門好不容易；進了門一路走去，既投不到可以過宿的逆旅，又找不到替換坐馬的驛站。然而他們帶來的福音，不只是一个加列勒漁夫的口訊，却是基督教會奇妙的展開，有傳教司鐸，也有教務議會，有宗教的基本信條，也有他的學府；這個教會剛從「尾大不掉」最可怕的危機中擺脫出來，是一個經過肅清以後，回復了青春，團結集中的教會，是一個密切參加控制過文明世界的命運之後，在征服了以後擴張的道路上，看得出和全歐洲完全同化了的教會。

把這基督教會所有全部的本質，移花接本似的，接到中國文化的老樹幹上的第一人，當然是利瑪竇司鐸，這是無

可爭辯的。利公的確是個很聰明的適應環境的典型人物，他在這一種差不多已經毫無希望的企圖中，憑着他精細靈敏，堅忍不拔的意志，竟告成功的。比他先來的，未始沒有，可是他可以跟他學得的，無非是失敗罷了。然而他可是成功的，便是他死了之後，萬曆帝還是那麼尊重他，欽賜他一塊葬地。

中國人的思想既然最是牢不可破，中國又是全世界那麼閉關自守，海禁森嚴的國家，那麼，利瑪竇究竟憑着怎樣奇妙的方法，來適應這種環境呢？這便是我們所要討論的，當前的妙題哪。當時許多和利公敵對的人們尤其是陽森派人的謗謾，把利公講得和奸細陰險小人一般，憑着巧妙的奸詐手段，打通門路，見到了中國皇帝。這件事，非到利公死後，大家不得明白；這真是一篇可惡的野話，現代讀者當然不是這等樣人，而且凡是知道原委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對他表示感謝的一般自稱和利公作朋友的人，想在他陳列出來，使人驚奇納罕的世界輿圖，和自鳴鐘等這些東西裏邊，尋求他能力的秘密。還有幾個竟把他當作飄洋賣貨的客商，可是真正的讀書人，決不會不懂得利公所以獲得成功，主要原因，全在他有高尚的道德，和精密的修身功夫，才能使人欽仰敬慕。也有些人竟會把他列在一「調和宗教信仰」的頭等專家之一；這種人的用心尤其是陰險可惡。利公的本旨，不過使公教中嚴峻的正宗派採取稍為溫和一點的態度，寬容中國人的迷信習慣罷了。只是我們和我們極親愛的朋友們分離了以後，無論我們覺得怎樣抱歉，為求歷史不失真實起見，我們不得不確認利公率真而且整個的是個虔誠的傳教士，一個熱情的耶穌會士。

假使我們要明白利公本人對於自己的傳教任務，懷着怎樣的思想，那真是非常容易的事。當他的任務快要終了，在他逝世前只有幾個月的時候，他曾直捷爽快，明明白白說過了。他在他筆記的序文裏（註一）寫着道，後世對於現代所

有種種偉大的經營，和種種已成就的事業，往往懂得這些事業，是怎樣做起的。我對於這種現象的原因雖曾一再加以研究，却總找不出理由來。否則但看一切事情，便是那些經過無限量發展而獲得結果的事情，開始時候，根本都是那麼脆弱，那麼細微，似乎將來決不會發揚光大的。創業人對於這個原因，大都漠不關心，不加注意，也不會用筆記錄下來。至少我們要說這一類事業，開創的時候，便有那麼許多繁劇的困難，把他包圍着；創業人拿出全副精神，一心辦事忙得不得開交，就一沒有興味，二沒有工夫，把辦事情形記錄下來啦。

這種失錯是缺憾，爲預防這種缺憾計，他就拿起筆來，從頭到底，分門別類地，記着他所搜集的，有關本題的一切。他說：「大部份的事情，是我親手經過的，或者接到過極準確的報告的；因此，如果天主聖意喜歡教那麼微小的一顆種籽，發育滋長，使他的聖教會，得到些好收獲，那麼比我們後來的虔誠的信友們，便能知道，應該從那裏起始，感謝天主的大恩給人講述天主怎樣在這最近幾世紀中，在相距遼遠的民衆間顯示過許多玄妙的奇蹟。假使天主不許一開花就結果，那麼我至少已經給後來的讀者們留下了一種証據，使後人知道我們耶穌會諸同仁，爲了要打開這條道路，在開闢這崎嶇的山林，創業的時候，怎樣受盡了一切的艱難和困苦。」

而且利公在這篇記載中還避免着一切文章的雕琢，他說：「既然大家不能懷疑這件引導人靈，使他們皈依天主正教的大事業，完全出於天主親自料理的結果，這件事我們講述起來，就絕對不必用修飾的詞令。對熱心敬主的人們講這種事情，惟有說得準準確確的老實話，才可以使他們最稱心最悅耳。」利瑪竇神父所承諾的，他果然實踐了。他的寫作，一點也不矯飾，也看不出經過甚麼雕琢，具有一種自然美，和一種不可抗的雅韻。他用明體的文調將各種對象予以闡明，繪

上彩色，使他們生動活躍。他在遍遊中國內地，研究各處風土人情間來再加深思熟慮之後，便已獲得了一種稀有的學問，能把那麼遼遠的境界中所有這一切情形，放在我們眼簾前；他的記述，也就成了活躍的大觀，使讀者感覺興趣。他一生忙碌，當然沒有餘暇來修飾他的文字，却有一種善於想像的天才，這種天才，不但為詩人所需要，史家也同樣少不得，少了就什麼也看不上。他有透闢的精神，辦事必求澈底；他但憑這種精神去辦事，儘管輕描淡寫，却總諸事繁榮，他的本性傾向慈善，可是他對待個人却力求一秉至公不肯過分寬縱。

末了，作者得聲明這部史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在講天主吸引他靈魂使他歸向自己的神工：天主怎樣但憑溫柔的寵愛，全不用暴烈的方法，先安排他度極卑賤，極窮乏，極冷靜的生活，然後加給他神力，使他懷着堅忍謙下之心，去幹那艱而巨的傳教大事業，這種事業，在許多人看來，簡直是一種妄想，他在華度了三十年超人的辛苦生活，却仍不失雍容閒雅的風度，一路有人慕名欵接，願作主人，還有許多孔門儒士，也對他深表景仰。

作者寫這部傳記時，效法這位典型人物，依照最嚴格的標準，處處留心，力求翔實，因此，字裏行間，不得不審慎推敲，讀者如果感覺深切的趣味，作者便已獲得報酬了。這部書中描寫的地方不多，在結構的實際上所需的描寫也很少；精神方面的紀錄，除利公自己的記敘外，也不多，或者竟沒有。但是到處可以見得到隨機應變的智謀，洞明事理的光照，內心的平衡，以及這倫理的和基督教的美德意識，這種意識給利瑪竇司鐸的一生常保持着一種氛圍，出了這氛圍以外，他的生活，就會變成一種難以索解的隱謎，大家也就可以各自隨着一時的衝動來解釋了。

(註一)利瑪竇傳卷一，一至二頁，作者之譯這一節原文，根據李葛蒲(Bishop)的著作一至三頁，不過已經畧加刪節了。

利瑪竇傳目錄卷一

上編

在中國社會的邊緣上

青年時代的回憶

一
五

第一章 第二章

二八
四七

第三章 第四章

六五
六五

第五章 第六章

八六
一〇六

第七章 第八章

一二五
一四六

西方科學和文化的流入

一四六
一六七

從肇慶遷往韶州

一八七
一八七

中國的文教

一八七
一八七

歐洲人研究漢學的開始時期

一八七
一八七

西洋儒士

一八七
一八七

在中國顯官蔭庇下

一八七
一八七

人文薈萃的南昌

一八七
一八七

西學堂

一〇四
一〇四

北上首京的初次嘗試

一一三
一一三

重到舊都漸入佳境

一四二
一四二

進入中國思想界的中心

一五七
一五七

南京城中福音的酵母

一七四
一七四

二次進京和太監馬堂的威脅

一九一
一九一

下編

諾比利開教前的葡屬印度

二八
二八

步武羅明堅司鐸後塵

六五
六五

西方科學和文化的流入

八六
八六

從肇慶遷往韶州

一〇六
一〇六

中國的文教

一二五
一二五

歐洲人研究漢學的開始時期

一四六
一四六

西洋儒士

一八七
一八七

在中國顯官蔭庇下

一八七
一八七

人文薈萃的南昌

一八七
一八七

西學堂

一〇四
一〇四

北上首京的初次嘗試

一一三
一一三

重到舊都漸入佳境

一四二
一四二

進入中國思想界的中心

一五七
一五七

卷一 上編

在中國社會的邊緣上

利瑪竇司鐸在他所著的「中華雜紀」中，描寫儒釋道三教所有的各種特色，怎樣治於一爐，成爲中國民衆的宗教之後，便稍稍提高了他的嗓子，拉起他文章的腔調，來描寫基多的教會，怎樣傳到了這中華帝國。（註一）他說：我們耶穌會同人依着成立本會的宗旨，梯山航海，到這麼遼遠的地方來，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討這崇拜偶像的中國的三頭巨魔，好援救無數不幸的人靈，脫於永禍；這個巨魔，比那雷納的三頭烟突兒（Hydre）還要嚇人。三千年來他憑着專制淫威，壓迫萬萬生靈墮下地獄，陷入萬丈深淵，從沒有人加以禁阻。我們耶穌會同人，依靠天主的仁慈，和所許的恩佑，不怕危機四伏，障礙重重，不許他們走進這閉關自守，海禁森嚴，還充滿着這麼許多人掩護自己短處的國家。其實，這是徒然！凡是耶穌的神國，聖十字架的兵器所到之處，世界上，或是地獄裏，有甚麼武力能够抵抗呢？

對於一個文藝復興時代的薛舍羅派人，這種稍爲過分一點的文字上的鋪張揚厲，是要請大家加以原諒的。他的拉丁文譯本，和法文的譯者，給他作品加上的標題：「耶穌會諸鐸對於中國某多教義的征討史」（註二）還要誇張咧。這「征討」兩字如果在人家眼光裏，並不把這種戰爭的比喻，看作一種武力侵略，而作爲和平自由的同化，那麼，這句話可

算是正當的，即使用「征服」（征服人心）二字也不算過分誇張。無論如何，我們一讀到開頭幾句話，便知道利瑪竇神父素來傾向著的寬縱態度，一點也沒牽動他去苟同他人的意見，恰是相反，他却毅然決然追隨著他的先輩典型，聖沙勿略的芳踪，邁步前進。

他講（註三）：『發動這精神戰爭，開始建立神國的第一人，便是本會的真福方濟各沙勿略神父，他把天主教傳入印度和摩六甲羣島，建立了教會之後，最後就到日本去宣化開教，一如人們對他宗徒精神所有的期望而獲得成功……。這位真福神父，深知日本所有一切的法制和禮教，都從中國得來，便想他如果能先使中國歸化，那麼不但給這聲名文物之邦的偌大中華，做了一件好事，而且這一下，也就容易使日本皈依了，真是一舉兩得的事……無奈這中華帝國獲罪上主，不合得到這麼一位大宗徒，使他棄邪歸正的主動人，而且這位真福神父一生辛勤傳教建立了許多神聖的大事業，這當兒，他去世升天，去領受賞報的時候，也已來到了；因此，他所有來華傳教的一切計劃，完全沒有實現。然而我們相信，假使他在世時候，曾求天主賜他能進中國，却沒有得到這個恩典，他到了天堂上，想必也為同會諸人，求過這個恩典，而得到了；但看他逝世三十年後，耶穌會諸鐸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之外，竟走進中國門戶，深入了中國內地。』接着利公便寫幾節敘述幾個在他以前的先進人物。他說：『沙勿略以後，又來了幾個給天主服務有勇氣的人，想設法走進中國內地，特別是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幾位傳教士，有幾個是從東印度（臥亞和摩拉加）方面來，有幾個是取道西印度（墨西哥和斐列濱羣島）來的，但是那些專心從事傳教事業，把這種事業，當做真福沙勿略留下的遺產一般看待的人，便是耶穌會的諸位司鐸。他們帶着滿懷神火，和葡萄商人結伴而來，來了以後，又持着絕大恆心，在中國門戶的通商口岸上，造下了住院，

一輩子住着。

『這種冒險事業經過了節節阻撓之後，種種障礙，一天比一天增加着，已到了半絕望的地步；那時，從衰萎中，使他復趨興盛，從瀕於滅亡的環境中使他回復生氣，這位着手成春的大人物便是在華耶穌會會長范禮安司鐸，「通常稱他Vallignani」他的親筆簽名是這樣，（註伍）他決計派幾位司鐸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庶幾有一天他們找到了門路，走進內地，就可以有備無虞。他打定了主意，就不顧幾個已經上了年紀，有過閱歷，以為這種企圖在中國是萬難實現的司鐸們，表示反對，寫信給駐臥亞的省會長，申請派遣一位適當的神父，到澳門來擔負這種任務——他手下這種人才一個也沒有，臥亞的省會長就給他派來了一位羅明堅神父。（P. Michel Ruggieri）

羅神父來了以後，還得襄助澳門的諸鐸，給葡萄牙信友們施行聖事，這就使他本身的任務，就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字，這件要事大受妨礙。此外，他獨自一人，不能兼做澳門廣州兩處的事務，讀書也不容易專心。那時范會長還在日本視察，到了報告以後，便設法把利瑪竇神父從印度召來。』

利公這幾句話，就直捷爽快的，把自己來華傳教的任務，介紹給讀者了。從此以後，他的記述，便是現着我們所稱為「澈底澄清」始終一貫的特徵，是一種既不得謂之誇大，也不當目為含混的衷誠，一種率真淳樸，和意旨正直，見不得人家口是心非，或是言詞閃爍，好像眼睛裏安不得一點飛塵一樣。自此以後，他絕不再談政治，不提私人利益……一切悉聽天主上智安排，擯去一切對於肉身世務的關心，殫精竭力，務擴張天主的神國。當他徊翔於「中國社會的邊緣」的時候，他要忍受，而且還要樂受他來華後那極沈長的最先幾年中，所有一切的艱難困苦；不這樣，當然不行哪！